



浙江历史文化专题史系列

浙
江

浙江近代乡村教育史

Zhejiang Jindai Xiangcun Jiaoyushi

李涛 著

江

杭州出版社

浙江近代乡村教育史

李 涛 著

杭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江近代乡村教育史/李涛著. —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4

ISBN 978-7-80758-242-7

I. 漢... II. 李... III. 乡村教育—教育史—浙江省
—近代 IV. G527.55 G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3253 号

浙江近代乡村教育史

李 涛 著

本册责编 林发标
封面设计 郭睿一
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杭州市曙光路 133 号)
邮编:310007 电话:0571-87997719
制 版 杭州万方图书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9
字 数 525 千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58-242-7
定 价 6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指导委员会

主任：赵洪祝

副主任：夏宝龙 王国平 巴音朝鲁 李 强
黄坤明 郑继伟 张 曦

成员：胡庆国 马林云 陈一新 胡 坚
金兴盛 刘希平 钱巨炎 乐益民
杨建新 钟桂松 陈 荣 林吕建
郑仓元 童 健 胡祖光 梅新林
许 江 邵占维 张金如 陈德荣
孙文友 徐止平 孙建国 梁黎明
张鸿铭 陈荣高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中各种元素、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众多方面的差异,建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文化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下,以自己的独特个性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区域文化入手,对一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全面、系统、扎实、有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藉此梳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繁荣和丰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规划和指导未来的文化发展蓝图,增强文化软实力,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舆论力量；另一方面，这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创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如今，区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各地重视，成为我国文化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今天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其目的和意义也在于此。

千百年来，浙江人民积淀和传承了一个底蕴深厚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的独特性，正在于它令人惊叹的富于创造力的智慧和力量。

浙江文化中富于创造力的基因，早早地出现在其历史的源头。在浙江新石器时代最为著名的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和良渚的考古文化中，浙江先民们都以不同凡响的作为，在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源留下了创造和进步的印记。

浙江人民在与时俱进的历史轨迹上一路走来，秉承富于创造力的文化传统，这深深地融汇在一代代浙江人民的血液中，体现在浙江人民的行为上，也在浙江历史上众多杰出人物身上得到充分展示。从大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到勾践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从钱氏的保境安民、纳土归宋，到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岳飞、于谦的精忠报国、清白一生，到方孝孺、张苍水的刚正不阿、以身殉国；从沈括的博学多识、精研深究，到竺可桢的科学救国、求是一生；无论是陈亮、叶适的经世致用，还是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无论是王充、王阳明的批判、自觉，还是龚自珍、蔡元培的开明、开放，等等，都展示了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凝聚了浙江人民求真务实的创造精神。

代代相传的文化创造的作为和精神，从观念、态度、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孕育、形成和发展了渊源有自的浙江地域文化传统和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精神，她滋育着浙江的生命力、催生着浙江的凝聚力、激发着浙江的创造力、培植着浙江的竞争力，激励着浙江人民永不自满、永不停息，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地超越自我、创业奋进。

悠久深厚、意韵丰富的浙江文化传统，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党的十六大以来推进浙江新发展的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与国家实施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相伴随的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就在于发展先进生产力与发展先进文化的

有机结合。今后一个时期浙江能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走在前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文化力量的深刻认识、对发展先进文化的高度自觉和对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工作力度。我们应该看到,文化的力量最终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文化的软实力最终可以转化为经济的硬实力。文化要素是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文化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文化素质是领导者和劳动者的首要素质。因此,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增强文化软实力,为浙江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是浙江人民的共同事业,也是浙江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使命和责任。

2005年7月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作出《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提出要从增强先进文化凝聚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入手,大力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八项工程”,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四个强省”。作为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之一的文化研究工程,其任务就是系统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成就和当代发展,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研究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未来的发展。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将重点研究“今、古、人、文”四个方面,即围绕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四大板块,开展系统研究,出版系列丛书。在研究内容上,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系统梳理和分析浙江历史文化的内部结构、变化规律和地域特色,坚持和发展浙江精神;研究浙江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异同,厘清浙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围绕浙江生动的当代实践,深入解读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发展。在研究力量上,通过课题组织、出版资助、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加强省内外大院名校合作、整合各地各部门力量等途径,形成上下联动、学界互动的整体合力。在成果运用上,注重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充分发挥其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

我们希望通过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用浙江历史教育浙江人民、用浙江文化熏陶浙江人民、用浙江精神鼓舞浙江人民、用浙江经验引领浙江人

民,进一步激发浙江人民的无穷智慧和伟大创造能力,推动浙江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今天,我们踏着来自历史的河流,受着一方百姓的期许,理应负起使命,至诚奉献,让我们的文化绵延不绝,让我们的创造生生不息。

2006年5月30日于杭州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序

赵洪祝

浙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素称“文物之邦”,从史前文化到古代文明,从近代变革到当代发展,都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众多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勤劳智慧的浙江人民历经千百年的传承与创新,在保留自身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外来文化的精华,形成了具有鲜明浙江特色、深厚历史底蕴、丰富思想内涵的地域文化,这是浙江人民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结晶,是中华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如何更好地使这一文化瑰宝为我们所用、为时代服务,既是历史传承给我们的一项艰巨任务,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项神圣使命。深入挖掘、整理、探究,不断丰富、发展、创新浙江地域文化,对于进一步充实浙江文化的内涵和拓展浙江文化的外延,进一步增强浙江文化的创新能力、整体实力、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发挥文化在促进浙江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历届浙江省委始终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早在1999年,浙江省委就提出了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2000年,制定了《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2005年,作出了《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经过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浙江文化大省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浙江文化建设“八项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地方文化研究项目之一。该工程旨在以浙江人文社会科学优势学科为基础,以浙江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现实课题和浙江历史文化为研究重点,着重从“今、古、人、文”四个方面,梳理浙江文明的传承脉络,挖掘浙江文化的深厚底蕴,丰富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推出一批在研究浙江和宣传浙江方面具有重大学术影响和良好社会效益的学术成果,培养一支拥有高水平学科带头人的学术梯队,建设一批具有浙江特色的“当代浙江学术”品牌,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升浙江的文化软实力,为浙江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强大的

精神动力、正确的价值导向和有力的智力支持,为提升浙江文化影响力、丰富中华文化宝库作出贡献。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开展三年来,专家学者们潜心研究,善于思考,勇于创新,在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等诸多研究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已设立10余个系列400余项研究课题,完成230项课题研究,出版200余部学术专著,发表大量的学术论文,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这些阶段性成果,对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提供了新的支撑力和推动力。

党的十七大突出强调了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极端重要性,并对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全面部署。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浙江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并坚持把建设先进文化作为推进创业创新的重要支撑。2008年6月,省委召开工作会议,对兴起文化大省建设新高潮、推动浙江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行专题部署,制定实施了《浙江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纲要(2008—2012)》,明确提出: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兴起文化大省建设新高潮、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主要任务是,在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卫生强省、体育强省的同时,继续深入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文化建设“八项工程”,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发展体系等“三大体系”,努力使我省文化发展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在文化建设方面继续走在前列。

当前,浙江文化建设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既面临千载难逢的机遇,也面对十分严峻的挑战。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始终保持浙江文化旺盛的生命力,更好地发挥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不断探索的重大新课题。我们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实施“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以更深刻的认识、更开阔的思路、更得力的措施,大力推进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回答浙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遇到的各种新问题,努力回答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努力形成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的研究成果。

继续推进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我们热切地期待有更多的优秀成果问世,以展示浙江文化的实力,增强浙江文化的竞争力,扩大浙江文化的影响力。

目 录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	习近平	(1)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序	赵洪祝	(1)
绪 论		(1)
第一章 清末乡村传统教育资源面临的近代化挑战		(11)
第一节	科举制度废除对浙江乡村教育的冲击	(12)
第二节	清末浙江乡村传统教育资源的近代化嬗变	(29)
第三节	辛亥前期浙江乡村教育的基本状况	(54)
第二章 北洋政府时期乡村教育近代化改造的起步		(67)
第一节	南京临时政府对乡村教育的政策关注	(68)
第二节	五四时期浙江知识群体对乡村教育的呼唤	(81)
第三节	北洋时期浙江乡村教育的近代化起步	(98)
第四节	大革命期间浙江乡村工农教育的局部兴起	(117)
第三章 南京国民政府早期 10 年乡村教育改良运动的高涨		(128)
第一节	南京政府乡村教育政策的制定及实施	(129)
第二节	浙江乡村教育思潮的兴起及实验区的推广	(167)
第三节	共产党在浙江各地农村教育变革的早期探索	(196)
第四节	南京政府初期浙江乡村教育发展的基本情况	(210)
第四章 抗日战争时期乡村教育的破坏和重建		(233)
第一节	抗战初期学校内迁运动对浙江西南乡村教育的促进	(233)
第二节	浙江抗日根据地农村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推广	(274)
第三节	日伪奴化教育政策对浙江沦陷区教育的破坏	(304)

第五章 解放战争时期的乡村教育：战火中的残破与变革	(322)
第一节 20世纪40年代末国统区乡村教育的残破困境	(322)
第二节 浙江教育乡村改造实验区的最后尝试	(326)
第三节 浙江解放区乡村教育及新民主主义理念的确立	(348)
第六章 我国乡村教育近代化变迁的理论反思	(364)
第一节 官方、民间及革命型乡村教育发展模式的碰撞和选择	
.....	(365)
第二节 乡村教育变迁对底层社会文化结构的影响	(381)
结语	(411)
参考文献	(415)
附录 浙江近代乡村教育大事记	(432)
后记	(448)

绪 论

一、研究的基本思路

最近二十多年以来,中国学术界研究教育近代化问题,往往将关注的眼光放在外来教育理论在本土的传播、中国教育制度的变革、现代大学教育的出现、教育家教育思想的实践及宏观教育历史的变迁研究上。诚然,这些问题都很重要,因为正是由于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才构建了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基本框架。但是,当学术研究在关注这些宏大论述的同时,我们却多少忽略了真正对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产生影响的乡村教育的变迁问题。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农业文明的海洋,乡村是一切变迁产生的基本温床。而自从 1904 年建立近代教育体系以来,我国金字塔式的学校系统,往往将大学建在省会,中等以上学校建在城市和县城,高等小学建在县城和大城镇。学生在接受完初等小学教育后,就必须离开乡村到城镇或县城去完成高等小学教育,并进入城市继续接受中、高等教育。从中央到省、市、县的各级政府只对中、高等教育投入注意力和资金,而把初等教育放任给乡村、士绅甚至私人,从而使公立教育在制度上不能与乡村社会衔接。而且,新式教育机构十分有利于中等以上阶层的子弟,因为只有他们才有机会完成小学教育,且有能力在城市接受中等以上教育,受益于国家所办的公立学校。而对于大多数乡村人口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大部分乡村学生进入城市,在习惯了城市生活的方便,接触了新式思想后,就再也不愿回到乡村社会去。因而,整个中国乡村教育近代化的变迁过程通常是缓慢而又艰苦,且往往处于自生自灭状态的。实际上,当大都市的中小学教育已经与欧美各国无太大差别的时候,我们的中西部乡村教育有的还在类似于私塾的复式教学中踟蹰不前。我经常在思考,当广大教育研究者在关注中国教育近代化像江海河流波涛汹涌、大潮滚滚的同时,我们是否可以将眼光透过理论和成功的繁华,基建在中国古老文化河流河床的底部,来关注我们乡村教育到底是怎样在欧风美雨的吹拂下,在不同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引导下,在战火、天灾、匪盗和党争下,在外来力量和自身的艰苦努力下,痛苦进入到 1949 年那个百废待兴的新时代的。

“近代化是一项没有英雄也不需要英雄的琐碎工程,尽管农民期盼与膜

拜英雄伟人，但是他们的进步，仍然不是英雄与伟人所能拉动的。”^①实际上，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过程中，乡村教育在科举废除后从私塾到学校的转型，在乡村文化不断被城市伦理冲击下，教育在基层乡村理念变迁中起到的作用，可能都是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问题。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乡村教育”并非狭义上改良派教育家所主张的“乡村教育”概念，而是涵盖了1912年至1949年间发生在广大乡村的所有教育主张、实践和变动，其中当然包括了乡村教育本身的新陈代谢和外来力量，例如政府、革命者及改良知识分子所做的一切努力。同时，这里所指的乡村，既包括了广大地处穷乡僻壤的农村，也包括了除县治、大邑外的大量中小村镇，因为在中国农村，小城镇往往是文化教育集聚和传播的枢纽。本书企图通过对近代浙江乡村教育试验活动进行历史考察和比较，最终从乡村民众视野中反映出这些教育活动对基层社会文化变迁及权力结构所带来的影响。因为，从乡村文化变动角度研究近代教育新陈代谢的缓慢变迁，不仅有利于加深对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的全面理解，还可以为当前中国农村教育现代化问题提供某种现实借鉴。

近代中国乡村教育始终是在迷茫、困惑和痛苦之中发生变迁的。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强力碰撞下，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震撼了中国农村社会的乡土基础，而且还冲击了与传统社会遥相呼应的农村教育。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乡村教育开始追随于城市教育改革，建立了许多新式学校。1898年，清政府下令把全国各省的书院改为学堂，全国各地的绅商纷纷设立公立、私立小学堂，许多乡村小学往往都由旧式私塾改良而成。据光绪二十九年（1903）颁布的《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规定：“各州县于初级师范学堂尚未齐设之时，宜急设师范传习所。”其招生对象是：“其凡在乡村市镇以教授蒙馆为生业，而品行端谨，文理平通，年在三十以上五十以下者，无论生童，均可招集入学传习，限定十个月为期。毕业后以准充副教员之凭照，即令在各乡村市镇开设小学。”^②农村社会环境的改变必然会引起新的教育问题，随着新式学校在农村的建立，私塾的地位日益受到动摇。1911年之前，晚清政府对私塾仍采取改良态度，但民国之后，由改良私塾逐渐演变为全面取消政策。1912年，浙江省曾一度发布通令：凡私塾设在学校附近一里半以内者，下学期一律停闭。^③但是，所有这些革命式变革所带来的变化都是极其缓慢而漫长的。拥有全国

^① 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21页。

^② 张之洞：《奏定学堂章程·初级师范学堂章程》，转引自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285页。

^③ 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小学校令》《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载《教育杂志》1912年第3卷第10期。

80%以上人口的农村,仍然是现代教育的荒芜之地。人们发现,那些模仿现代教育制度而在农村建立的少量新式学校并没有真正成为广大乡村教育的主流力量。^①事实上,非正规的私塾体系与正规的学校教育体系一直并存到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正如李大钊评论的:“有的乡村虽然成立一些初等学校,但他们也不过刚有一个形式,小学教师的知识不晓得去现代延迟到几世纪呢!”新学的内容未能被广泛地介绍,文盲仍然充斥着中国广大农村,“贫民永沦于奴隶,富者益智,贫者益愚,因智而贵,因愚而贱。”^②新学与旧学的冲突,学校教育与农村社会生活的矛盾日益突出,乡村社会中二元对立更加明显。中国相当一部分地区农村的文盲率反而较以前有了不同程度的上升。

列强侵略、军阀混战、天灾人祸使中国农村日趋破产并接近崩溃的边缘,这便促使中国的政界和知识分子都把目光投向了农村,各种政治势力纷纷关注农村,提出主张,并进行具体活动。蒋介石成立了“农村复兴委员会”,在加强对农村控制的同时,也在谋求通过对农村进行经济改革来改变农村的现状。一些知识分子发出了“救济农村”、“建设农村”的呼声,从事农村改良实验活动,并迅速汇成一股颇有声势的农村改良浪潮。1931年,蒋介石先后会见了晏阳初和梁漱溟,与他们谈及乡村建设。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先后成立河北、山东、江苏和安徽等省的地方自治筹备委员会,指定晏阳初为河北省地方自治指导员,山东地方自治指导员则由梁漱溟担任,知识分子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得到国民政府的承认和支持。1932年12月,在国民政府召集的第二次内政会议上,晏阳初、梁漱溟、高阳等人积极倡导发起全国乡村工作组织之议,并于1933年7月14日至16日在山东邹平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参加者63人,分属35处机关团体,实际上把全国乡村教育运动连成了一个松散的整体。此间,由民间教育机构和学术团体创办的各种乡村建设试验区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涌现。据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统计,20世纪30年代初期全国从事乡村改良运动的团体达600多个,他们建立的乡村实验点或实验区有1000多处,而其中仅1925年至1935年间,各种乡村教育实验区就多达193处。^③这些运动基本上是由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所倡导,他们主张将自己的活动中心由城市转向农村,提倡“到乡村去”、“到民间去”、“复兴农村”、“建设农村”,致力于农民教育和农村社会改造。这些人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文化”或“教育”问题;中国并不需

^① 李大钊:《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4、78页。

^② 张树、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969页。

^③ 章元善、许仕廉编:《乡村建设实验》第2集,中华书局1935年版,第19页。

要任何制度性的根本改革,而应返回到“农本社会”、“伦理本位社会”,于是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当然,这支倡导“以农立国”的队伍是很复杂的,并非都像梁漱溟那样具有明确的理论模式,不少人或者出于痛恶资本社会影响之弊端,或者是深感农村之急需救济,或者是出于一种农村乌托邦式的思想。

应该说,在那个时代,一些热心乡村教育和改良的知识分子对农民的同情和关爱其实并不比共产主义者少,他们也同样富有牺牲精神。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李景汉等人克服千难万险进行的乡村试验,应该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他们一点一滴的改良,对于满目疮痍的农村,委实有点像精卫填海的努力,吸引力太小,甚至显得有些迂腐。这就是那些苦心孤诣的乡村改良者不仅要遭受统治者和地方势力的刁难和打击,还要不断地被各方批评和嘲笑的最大缘故。在农民基本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以前,企图动员他们积极参加乡村建设的困难可想而知。在晏阳初劝农民进平民学校时,一位农民就对他说:“你老的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因而梁漱溟所感叹的“农民不动”就很直接地说明了乡村建设运动没有触及当时农村社会的基本问题,没有从农民的根本需要出发。加上任何整体的社会改造运动都离不开政治权力的支持,乡村建设运动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比较暧昧,国民政府为了自身的政治需要逐步将乡村建设运动合法化,并将其纳入国民政府政权建设的框架中,可以说知识分子的乡村建设运动逐步被国民政府“收编”了。在此后不久的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战乱中,乡村建设的努力最终化为泡影。

在当时中国总的社会背景中,乡村建设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必须将中国建设的基础放在农村。当时的农村真正欢迎的是那些具有先进头脑和激进倾向的知识分子。农村布满了干柴,也不缺乏火种,欠缺的恰恰是那些添加助燃剂,并能使大火持续燃烧下去的人,而这些激进知识分子正好充当了这一至关重要的角色。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进入农村,革命的鼓动压过启蒙的努力成为了一种历史的选择,变革只有在革命的旗帜下才会在农村拥有市场。共产党的根据地模式,实际是将一种新的乡村体系纳入政治和军事斗争中并取得成功的尝试,也可以说是后来新中国建立后乡村教育建设的“演习”。尽管革命本身包含着现代化的意义,但是革命的破坏性始终略大于其建设性,被现代化教育抛弃的农村最终选择了损害现代化的自我革命道路。20世纪最初30多年的历史告诉人们,在中国乡村走常规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人们发现,似乎只有通过彻底革命才能真正使农村走出被现代化所抛弃的困境。

为何要选择浙江作为村落视野中的文化变迁与权力更迭研究的典型区域呢?这是因为近代以来,由于浙江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文化教育传统,其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表现出了明显的区域特色。首先,浙江地处东南,

宁波、杭州开埠较早,位于受西方文化教育冲击的前沿部位,其乡村教育的变迁必然具有某些先发性的特点;同时,浙江又是传统教育根基深厚的区域,明、清两代科举无不以运河两岸的城市带为中心选士区域,士绅及宗族势力之影响根深蒂固。张耀翔通过研究北京国子监进士题名碑发现,在清代进士及第的 342 人中,浙江有 81 人,占到了全国总数的 23.7%,排名仅次于江苏而位于全国第二位,其中尤以政治及教育人物为多数。^① 科举废除及新学之兴在浙江乡村引起的震荡无疑是强大而又深远的。另外,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浙江既是广大近代教育家实践其教育主张的基地,又是国民党领袖蒋介石的老家,还是共产党的诞生地。所以就有了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对杭州、宁波等地乡村教育的官方改造政策,中国共产党在闽浙赣苏区和浙东、浙南根据地的农村教育改造、民间乡村教育思潮,特别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余杭县的诸家桥、宁波的白沙、长兴县溪口镇农村改进试验区的兴起等不同农村教育主张在浙江的试验和推广。浙江地方政府对乡村建设的提倡也不遗余力,例如 1928 年沈玄庐在萧山县设立衙前自治筹备会,注重自治工作;1931 年中华职业教育社与鄞县地方人士合办自治乡村改进区;1934 年桐乡县政府创办南日晖乡新农村试验区,以及永嘉县农村合作实验区、杭县凌家桥民教实验区等,均属颇有成效者。^② 对不同类型乡村教育主张在浙江的激荡变迁过程及其对乡村社会文化及权力结构的深层次反思,在全国都有着个案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前人研究的主要成果及启示

江浙地区的乡村教育近代化起步较早。早在 1902 年,曹梦岐就于浙江金华创办了私立乡村学校,成为中国乡村教育近代化的先驱,比著名乡村教育家陶行知提倡乡村教育还早了 30 余年。他主张男女同校、知行合一、因材施教,鼓励学生参加劳动实践,并在乡村倡导女生放足、禁止赌博、禁止迷信等,而这些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有提倡的必要。1904 年,李文鸾在东阳县东白乡仙朱岭创办农夫文化实用夜校班,为金华地区农民成人教育之始。光绪三十一年八月(1905 年 9 月),清廷下诏废科举、兴学堂,一大批地方士绅就开始关注本地教育的转型,一时新学勃兴。浙江各地先后有 180 多所书院和一批乡村学塾分别改成中学堂和小学堂,出现了兴办近代新式学堂的热潮。至宣统三年(1911)的六年间,全省各类学堂迅速增多,各类小学增至 2966 所,其中简易识

^① 葛绥成编:《分省地志:浙江》,中华书局 1939 年版,第 81 页。

^② 乔启明:《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据商务印书馆 1947 年版翻印),转引自周谷城主编:《民国丛书》(第四编,社会科学总论类),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2 年影印版,第 443 页。